



訪問余達心牧師

引言：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就朝向深廣的神學世界竭力開發，中外古今的神學都納為我們的神學資源。我們尤其重視人物專訪，因這樣更能有血有肉地認識神學。今期訪問，找上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前院長余達心牧師，一位被視為近幾十年香港福音派的領軍人物、國際性大會及神學會議的「東方代表」講員。是次訪問，更是難得的現場專訪可插入討論，訪問錄音稿再經余牧師悉心整理，去蕪存菁。在此特別多謝退休後仍忙於事奉的余牧師，用上大量時間精力，分享他服侍這一代的故事。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余達心牧師（余）

徐：余牧師您好！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此次專訪，從一開始就將您列為重要的訪問對象，如今終於有幸與您對話。我們的訪談主要圍繞「一生回顧」作展開，重點探討您的神學思想。首先，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的家庭背景，以及從童年到中學階段的成長故事？

余：我出生在一個原本相當富裕的家庭。父親從事造船業，在長洲擁有兩間船廠。然而，在我六七歲時，家道中落，家中欠下巨額債務，這是我人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家道中落後，生活變得異常艱難。記得三年級時，我常常因無法繳納學費而被老師要求回家取錢，否則不能上課。為此，我一度拒絕上學。後來，母親為我找到了長洲公立義學，那是一所完全免費的學校，學生甚至可以赤腳上學。當時四年級有一個空缺，於是，我從三年級跳到了四年級。

雖然學校的條件簡陋，但老師們都是來自國內中山大學或嶺南大學。他們不單學問好，教學非常投入，對學生有如子姪。學校的校訓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中國文化氛圍濃厚。從四年級開始，我們就學習古文，五年級時甚至嘗試寫詩。記得有一次，老師以「小黃牛」為題讓我們作詩，我寫道：「我是一頭小黃牛，一生出來就會走……看到屠場眼淚流。」這些教育經歷讓我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學校還注重愛國教育，比如禁止穿日本拖鞋，違者會被沒收並當眾燒毀。此外，每個學生都分到一小塊地，自己耕種，這種教育方式讓我受益匪淺。如今，距離小學畢業已過去 64 年，我們班級仍保持每年兩次的聚會，這份情誼讓我倍感珍惜。

我還記得中二那年，我填了一首詞。表達對國家分裂的感歎。1967 年，我剛進大學不久，時值香港大暴動，剛好毛澤東的詩詞選集出版，我讀後在選集的封面內頁填一首詞《浪淘沙》作回應：「戰筭三十年，民堪凌賤，只看紅旗揚威艷，不聽庶里悲切咽，悽怨衝天，感慨望神州，山河依舊，惟歎風雨鎖層樓，欲歸何奈已而無舟，空費思謀。」又 1974 年那年，我在美



國讀書，當時女朋友（即現在的太太）寄了一幅圖片給我，繪畫一個年青人在海邊看著一些海鷗在飛，月亮剛剛在薄霧中升起，她囑我寫首詩給她，大概期望我寫一首懷念她的情詩，但我寫一首愛國的詩：「月籠霾霧大江闊，孤鷗驚索歸群渡，歸群渡，望斷鄉關，雲海沉沉楚天暮。」當時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仍未完結，心中牽掛國家，「歸群渡」表達回歸那被烏雲低壓的國土的心願。愛自己國家民族的教育，早已孕育在我的人生中。我小學六年級會考後入讀長洲官校一年，我的一個堂叔看見我比較聰慧，覺得我繼續讀中文中學沒前途，資助我「出埠」就讀英文中學，於是我去港島同濟英文中學讀英文中學二年級。因學費由堂叔支付，所謂長貧難顧，便想盡快讀完中學，遂決定轉到另一間中學，報讀中四。

考入文理中學時，起初英文成績並不理想，但我進步很快，並在會考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然而，家庭的經濟壓力始終未減，為了繼續學業，我一邊讀書一邊為他人補習以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我們住在長洲荔枝園的一間鐵皮屋裡，條件極為簡陋，雨天時屋內地面泥濘不堪，有時甚至無米下鍋，只能早早睡覺。後來，地主要求我們購買那小小的一塊地。要借錢買地，家人再次陷入困境，於是要求我輟學工作。那時正在讀大學預科 **Lower Six**，一心要考入香港大學醫科。但為了幫補家計，我只得輟學，到中華基督教會的彩虹邨基華小學任教，一方面幫補家中經濟，一方面儲備學費，以備日後讀 **Upper Six** 之用。同時要自修備考 **Ordinary Level (O Level)**。工作一年攢夠學費後，進入聖馬可中學攻讀高級預科(**Upper Six**)，並順利通過香港大學的高級程度入學考試，卻未能獲得大學錄取。台灣的台北醫學院錄取了我，卻因時局緊張，母親極力反對，醫學夢碎。結果入讀香港浸會學院修生物科。當時的計劃是，完成生物學位後，再赴美國攻讀碩士，以求能進入醫學院。這段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人生道路雖未必盡如所願，但只要堅持努力，總能找到新的方向。

徐：余牧師，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信主的經歷？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關鍵人物影響了您的信仰和神學思考？此外，您是如何在長洲的教會中受到栽培並最終獻身於神學事工的？值得一提的是，長洲這個小島似乎很特別，培養了不少日後在教牧和學術領域獨當一面的人才。

余：我的信主過程充滿了曲折與思考。我原本是相當反對基督教的，一方面因為熱愛中國，而基督教是坐戰艦進來中國傳道的，因而對基督教有些反感。我同時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上帝存在與否難以確定，也多少受進化論的影響。中四那年，一位同學常向我傳福音，我卻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如果再提基督教的上帝，就連朋友都沒得做。」然而，中五會考前，這位同學到我家探我，看到我住的地方，環境非常惡劣嘈雜，很難想像我如何在此預備會考，遂邀請我到他家暫住數月，以備戰考試。他家位於般咸道，環境寬敞，原來是一間空置的圖書館（學海書樓），由他們三兄妹看守。令我驚訝的是，儘管考試迫在眉睫，他們每天仍虔誠地堅持 9 點至 10 點用一小時讀經禱告。附近的合一堂教會還有青年團契，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禱告、學習。有一晚，我好奇在附近聽聽他們搞些什麼，才發現他們是為我祈禱、為我相信主祈禱。之後我就說，你們不用為我祈禱，浪費時間，我不會相信的。然而，他們仍然對我關愛如常，我甚受感動，因著這樣的基督徒見證，我對基督教就放下一些抗拒，也有了一些好感。



畢業後，我進入中華基督教會的基華小學教書。校長是一位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他破例錄用還不夠 16 歲的我，並給予公平的薪資。這段經歷讓我對基督徒的見證有了新的認識。

那時香港學校不足，所以大多小學都分上、下午兩班。我當時教上午班，有整個下午自修以備考，當同事們都悠閒玩樂時，我得回家溫習。一天我乘船回家途中，想起同事結伴娛樂，而我卻必須回家苦讀，心中鬱悶。在船上，我不禁自問：「為什麼不跟他們一起去玩呢？」隨即又提醒自己：「你要考大學啊，必須抓緊時間讀書！」接著，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浮現：「就算考上醫科，當了醫生，那又怎麼樣？」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生命意義的問題。作為一個向來現實(**pragmatic**)的人，我很少會思考這類問題 — 畢竟在成長過程中，光是解決溫飽問題就夠讓人操心了，哪還有空間思考人生意義？這次乘船突然思考人生意義，感到迷茫，至而哭了起來。回到家中，我跪下來禱告：「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請告訴我人生有何意義。」雖然當時並未完全接受基督教，但我的心已向那更高的存在敞開。在尋道期間，也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的破碎以及詭詐。謙卑下來，接受基督的救贖，並參加合一堂的青年團契，也在那裡得到很好的信仰栽培。

合一堂的青年人熱心傳福音，我也深受感染。信主後不久便先帶領好友曾達乾信主。他後來在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當醫學教授，並在芝加哥一個華人教會任長老。此後我再接再厲帶領我二哥信主。他是一個沉迷賭博的油漆工人，並且非常左傾，所以每次跟他講福音，都很難說得進去，但在我鏗而不捨的堅持下，他終於信了主，更奇妙的是，他決志信主的那一刻就決定跟賭博一刀兩斷，自那時起就真的不再賭。並且他有一個很好的生命見證，為人良善，做生意誠信至上，對人有極真摯實在的關懷，特別對貧窮人。接著我也帶領大哥信主，之後帶爸爸信主。媽媽則極力抗拒，十多年後也因我和二哥的見證，結果也信了主。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宣道中學教授生物學(**biology**)。當時宣道中學剛開設中六年級，後來又增設中七年級。我先擔任中六(**Lower Six**)班主任，之後又負責中七(**Upper Six**)班級。我們那屆中七學生的表現尤為出色 — 文科班 7 名學生中，有 4 位考入了香港大學，其中包括楊慶球師母；理科班也有多位學生成功進入中文大學。任教三年後，我獲得了福樂神學院的全額獎學金(**full scholarship**)。當時我計劃完成三年神學訓練後，回港從事基層福音工作，並盼望加入當時由陳天祥弟兄剛成立的工業福音團契。由於我出身貧寒，深諳基層民衆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在向勞工階層傳福音可算頗有心得，也帶領不少人歸信基督。

福樂神學院的第一年，對我的信仰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這所學院雖然是福音派(**Evangelical**)背景，但學術氛圍十分開放。第一學期修讀釋經學(**hermeneutics**)時，課程涉及「歷史性耶穌」(**historical Jesus**)的探討，這直接關係到聖經經卷的歷史可信性(**historicity**)問題。作為一個習慣追根究底的人，我不斷提出質疑，甚至一度瀕臨信仰崩潰的邊緣。記得有一天的晚餐後，我騎著摩托車外出散心，結果在另一個城鎮迷了路 — 這個經歷恰似我當時在信仰上的迷失狀態。



我的神學思考歷程始於福樂神學院。第一年第一學期，我因深入研究「歷史性耶穌」的問題而陷入信仰危機。到第二學期，我選修了 Lewis Smedes 教授開設的（The Search for Certainty）課程。Smedes 教授是一位思維敏銳的倫理學教授，他的教導令我受益匪淺。有一次，他看完我的論文後特意找我談話說：「Carver，你將來打算做什麼？」我回答想回香港向基層勞工傳福音。他卻意味深長地說：「你沒有對自己誠實！」“you are not being honest to yourself”。我困惑不解，他解釋道：「我觀察到你在課堂討論時總是充滿熱情。」這番話讓我深思——確實，我對神學思考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給我的論文打了“A”，並評價道：「你應該考慮成為一位福音派神學家。」“you should consider yourself a future evangelical theologian.” 這個評價成為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當時我獲得的是三年獎學金，原計劃完成道學碩士(MDiv)後就回港從事基層工作，不再繼續深造。但受到 Smedes 教授的啟發後，我決定調整計劃：在前兩年全力完成 MDiv 課程，希望用第三年的獎學金攻讀神學碩士(ThM)。為此，我加倍努力，同時在校內打工以支付額外課程的學費。福樂神學院很體諒我的處境，允許我延期繳納學費。

然而，當我順利完成 MDiv 課程準備繼續攻讀 ThM 時，校方告知我的獎學金僅限於 MDiv 階段。就在此時，我未來的指導教授 G.W. Bromiley 伸出援手。他為我找來新的獎學金並結清我在學院所有的欠債。在他的幫助下，我最終在三年內完成了 MDiv 和 ThM 兩個學位課程（ThM 學位遲一年才頒發），為日後的神學事工奠定了堅實基礎。

加入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契機，要追溯到我刚進入神學院的第一學期。當時我收到關於中神成立計劃的宣傳資料，特別是趙天恩等人編寫的中國神學通訊(bulletin)，讀後深受感動。至今仍清晰記得，某個清晨六點多，我走出宿舍看見天上泛白，內心充滿對華人神學發展的期盼——雖然那時從未想過自己會投身神學教育。那年聖誕假期，我專程前往美國三藩市參加中神舉辦的大型會議，首次見到滕近輝牧師等前輩，也與趙天恩有了初步接觸。

1974 年，當我讀神學院二年級時，趙天恩等人來到福樂「揀卒」，就是物色人才。經過幾天深入交流，他們邀請我加入中神，滕牧師隨即發來聘書。就這樣，我在完成神學碩士(ThM)論文後便返港任教，未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1975 年參與創校工作兩年後，我決定赴愛丁堡大學跟隨著名神學家托倫斯(T. F. Torrance)深造。這個決定源於我在福樂就讀時接觸到他的著作(*Space, Time and Incarnation*)，書中將物理學與神學結合的創見令我震撼。我與幾位同窗組成的讀書會還研讀過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 *The Tacit Dimension*，他是一個敬虔的基督徒，也是一個哲學家，書中他提出的「知識」(knowledge)理論突破客觀主義／科學主義的認知框架，肯定主體與客體互動的事實，認知在一種關係下發生。這些思想都與托倫斯的研究相互呼應。我們幾人因此約定要追隨托倫斯學習。

在愛丁堡期間，我的研究聚焦於「時間」議題，特別是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對西方傳統的批判。托倫斯教授當時剛獲鄧普頓獎(Templeton Prize)，已決定退休，卻



破例收我為關門弟子。每周兩次的晨間研討課上，我們逐段研讀齊克果(Kierkegaard)的《哲學片段》(*Philosophical Fragments*)。這段師徒情誼令我獲益終生。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這段時期向他提交了一篇作業〈時間不同層次的意義〉(*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ime*)，這作業竟獲得托倫斯賞識，推薦至《蘇格蘭神學學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發表。這對一位博士生而言是莫大鼓勵。托倫斯退休後，我轉赴牛津大學跟隨海德格爾研究專家麥克默里(John Macquarrie)繼續探索「時間與存在」的關係。

這段信仰與學術交織的歷程，讓我深刻體會到神的帶領與恩典。無論是基層的福音工作，還是深奧的神學思考，都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徐：您的博士論文提出「以基督教的立約本體論超越希臘傳統的本體論」，這對您日後神學發展具有什麼引導性？梁燕城也是研究本體論，曾表示很有興趣了解關於您博士論文提出的「用關係超越實體」的概念，這種取代肯定實體概念是怎樣的？是否對您日後的神學發展具有指導性？

余：我本質上屬於改革宗傳統(*Reformed tradition*)，加爾文是我十分敬佩的神學家。說到我與 Calvin 的相遇，是在我讀神學幾乎要放棄信仰的時候。我的老師 Bromiley 建議我去閱讀他的巨著《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我發現 Calvin 做神學的方式與當時我的神學進路(*theological approach*)截然不同。

我當時探討的是可能性(*possibility*)的問題：認識上帝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如何認識？我追問歷史耶穌(*historical Jesus*)的問題，即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問題，都是從可能性出發。但 Calvin 不同，他是從上帝的真實性(*the reality of God*)開始的。也就是說，先被神抓住，經歷祂的實在，聆聽祂揭示自己，與祂對話以進深的認識祂。所以，閱讀他的《基督教要義》時，彷彿看到一個人在禱告、在敬拜上帝。閱讀過程中，我心中產生一種「心靈的溫暖」(*warming of the heart*)，這是被神感動的一種體驗。

從此我開始更深入了解加爾文。研讀他的著作時，其中散發出的敬虔甚至可以讓人落淚。因為他作神學思考是以一種敬拜的心態，是在經歷上帝的真實後對祂及祂的啟示作出深思。特別是在《基督教要義》中關於基督徒生活的部分，你會發現他對上帝的認識、對救恩的認識，都匯聚於上帝的約愛(*covenantal love*)以及我們對這約愛的回應。有一段特別感動我。他說：「我不屬於我自己，我屬於我的主」(*I do not belong to myself, I belong to the Lord*)，這個主題在後文中反覆出現。簡潔清晰的宣認，直指當代個人主義、極端自由主義的要害。

哈佛哲學教授 Michael J. Sandel 對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or liberalism*)有一個精闢的定義：

「自由主義的基本定義就是自我擁有(*self-possession*)：我屬於我自己；我擁有自己，我擁有屬於我的一切權利。」*"I belong to myself; I possess myself, I possess all the rights that belong to*



me” 這與加爾文的自我定義 - 「我不屬於我自己，我屬於主」 - 形成強烈的對比。此外，他神學中最核心的框架就是「約」(covenant)。上帝因着祂湧溢的「約愛」(*chesed*, covenant love) 創造一切。「約」是世界存在(being)的基礎，也規範了物與物、人與物、人與人存在的狀態。

因此，我們對「本體、實體」(being, substance)的理解，必需在「約」的框架下理解。沒有約的承托、規範，本體、實體只是抽象的存在。受加爾文的影響，我的整個神學框架開始成形，我博士論文的方向也隨之改變。「約」這個概念特別吸引我，成為重要的思考框架：我與神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我與自然的關係。跟隨 T.F. Torrance 學習期間，除了研究時間問題外，他還要求我閱讀英國哲學家兼神學家 John Macmurray 的著作，特別是 *The Self as Agent* 和 *Persons in Relation*。這些著作強調關係(relation)對人的本質的重要性，在這裡可找到與中國哲學、中國思想和中國傳統一個很深的共鳴。

牟宗三對「仁」的精妙解釋：「仁者，以感通為聖，以潤物為用」(可能出自《中國哲學的特質》)，與這些觀點產生共鳴。這使我放棄了時間問題的研究，轉而開始研究「約」與「本體」的關係。忽略了「約」的觀念，「本體」變得蒼白和抽象。

我的論文提案(thesis proposal)經歷了長期掙扎才形成：「對比兩種本體觀的模型」(the contrast of two ontological models)。一方面是希臘和西方哲學傳統對實在、真相(reality)的論述。我大膽地從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直接跳到笛卡兒，認為這是一脈相承的傳統。雖然笛卡兒聲稱對先前傳統持懷疑態度，甚至質疑亞里士多德傳統，但我的論文大膽證明他的本體論本質上延續了亞里士多德。

有個插曲是我的論文指導麥奎利 (John Macquarrie) 看到我的論文提案後很傷腦筋，試圖勸我放棄這個方向。他休假期間，安排我跟隨一位舊約學者(John Barton)，旨在讓他告訴我，約的觀念無甚可觀。這位導師看了我的提案後，對我說這個論文不可能完成，因為在舊約中「約」的觀念只是邊緣性的(peripheral)。我不服氣，回去研讀他十年前完成的論文，發現他確實認為「約」在先知書中根本並不重要。可是，我卻堅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經常與麥奎利見面，每次都會讀一篇論文給他聽。有時他會回應說：「我也不太明白你想做什麼？」但他對我很好。隨著論文逐漸成型，有一天他說笑的對我說：「噢，現在我終於明白你在做什麼了，你試圖超越海德格爾(Heidegger)！」

英國的傳統很好：論文是你自己的事，教授不會干涉(intervene)，只會提醒你，這研究很難，可能無法完成，但如果你堅持，就要自己承擔後果了。

基本上，從希臘到笛卡兒的思路必然導致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現代的極端個體主義的根源



(root)就在這裡。我認為西方文化危機的根源，正是從希臘哲學傳統發展而來。我用「展開、展現」(unfold)這個詞，意思是逐步展現，直到展開出整個西方文化的個體主義，進而個人主義。

徐：您在不同時期到國內講學時曾指出中港兩地學者學生彼此了解不足，能否詳細說明存在哪些問題？我們推動「中華神學」，認為雙方甚需深度會通。

余：那些從事神學思考的國內學者，通常都是學養深厚的文化人。他們往往更具哲學思維(philosophical)，傾向從文化與論述的角度來探討神學議題。然而，相較於我們在香港、台灣或海外成長的學者，對於西方豐富的神學傳統，無論是好或壞的方面，都較為重視。或可以說是重視聖經的道統和歷史神學的學統。

以我自身的神學探索歷程為例，像奧古斯丁這類重量級神學家，我可以說有一定的理解。即便是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這樣的教父神學家，我們也都有所涉獵。國內的學者在這方面的關注可能就稍嫌不夠。〔徐：他們或許只能閱讀翻譯本〕然而，這些譯本往往難以傳達原著的精髓，這確實相當可惜。更遺憾的是，許多重要著作根本尚未被翻譯引進。

必須肯定的是，國內學者的學習態度非常積極，他們追趕的速度相當快。但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有幸能承襲某種傳統作為根基，這點至關重要。以我為例，我的改革宗傳統就是重要基礎，加爾文的思想可說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糧。這些豐厚的改革宗資源(reformed resources)，我常稱之為「靈性與智性資源」(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具有重要的價值。

這樣的學術根基帶給我們一項重要優勢：我們對教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顯現的各種問題，以及其中的得失成敗，都有較全面的認識。當然，國內學者在思想開放性方面表現得相當突出，這點值得特別肯定。

徐：所以如果，他們有機會出去外國留學，其實他們也一樣。信了主、也做這些思考的人，他們往往能力比我們高，有些人可能不相信我這麼說，不過我認識一些是很聰明的。您想一下在清華北大畢業的，那些都是尖子來的。另一方面，您發現他們有沒有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神論限制他們？

余：我反而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他們有些人的確想跟那個政治現實有某種程度的融和，好比說劉小楓，他就是文化基督徒，他其實到最後，也是想對於當時的政制有一種融合的企圖，所以他後來就研究一個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並幾乎對他頗為推崇。而施米特對西方的自由憲制主義頗有嚴厲批判，按一般評論，他被認為是支持威權政制的。劉小楓為什麼要研究他？在 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是相當開放的時期，出了一批人，基本上好像擺脫了某些束縛。譬如詩人北島，他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有很大膽的表達〔編按：北島聞名中外，晚近為中文大學所聘，並創立香港詩歌節基金會〕。從事基督教研思的學者也充滿了反思價值的



情操。當碰到了某些政治、價值的界限，便得思索如何與實際處境融合。

徐：中國神學研究院半世紀前的創校期已有您參與其中，後來您更協助浸會大學建立宗教與哲學系。這段時期可說是香港福音派在高等神學教育與大學學術界的開拓階段，能否分享當時的深刻體驗？

余：我本質上是一個文化人，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熱愛與興趣，因此進入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對我而言是滋養心靈的過程。不過，當時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處理行政事務。宗教哲學最初只是一個教學單位(unit)，人手極少，要將其發展成一個完整的學系(department)實在耗費不少心力。我於 1984 年加入，經過四年努力，終於在 1988 年成功開設學位課程(degree program)，這比其他許多學系更早達成。其間我招募了優秀人才，例如特地延攬的江丕盛教授、羅秉祥教授等。

開設學位課程的過程極為艱辛。最初由 12 位英國評審委員組成的團隊否決了我們的申請，當時副校長告知將於兩天後公布結果，他安慰我說：「別失望，下次再嘗試。」但我不願放棄，立即與多位評審溝通，強調這個課程對香港的重要性。評審團的領袖是牛津大學的佛學教授 Professor Gombrich，也是帶頭否決我們的學位課程的人。最大理由是我們的教授團隊單薄以及藏書遠不合格。經過兩天艱辛的遊說，最終，他們提出若干條件，然後支持我們開辦學位課程。這段經歷讓我學到很多，尤其是如何爭取外界認同，為弱勢學系開拓發展空間。

徐：您當時創建宗教與哲學系時納入佛教研究，是否因為您認為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不應局限於基督教？

余：評審要求我們專注基督教研究(Christian studies)，但我認為宗教研究應該更開放。Gombrich 教授建議我聘請佛學專家，於是我們邀請了香港少有的佛學權威，吳汝鈞教授。

徐：這些來自儒、道、佛與基督教背景的學者共事時，是否遇到困難？

余：確實有挑戰。例如我們有位研究康德的神學家教授，他專注研究康德的，其他東西他都不理的，性格較自我中心，且對學術生涯有強烈的個人議程(agenda)，需要花費很多精力協調。這段經歷也讓我結識其他學系的學者，擴闊了我的視野。此外，我還需推動校內宗教活動，例如教師團契。

徐：當時台灣是否尚未設立類似的宗教與哲學系？

余：是的。當時的文學院院長本想將宗教與哲學分拆。在我晉升面試前，他毫不掩飾地表示：「若你同意分拆，升職應相當順利。」在會見時這位院長連同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向我施壓。我反問他：「您認為西方哲學現狀如何？它正在步向自毀(committing suicide)的境界！」我引用牛津大學哲學教授 Bryan Magee 的著作 Confessions of a Philosopher 以自己作為一名哲學家的身



份，親身體悟到西方哲學的失落。我同時強調在中國，哲學與宗教密不可分。最終我說服他們，在中國文化處境中保持兩者的結合才是明智的選擇，分拆計劃因而擱置，而升職也同樣擱置了。

徐：上世紀 80 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之際，您和一批教會領袖推出《信念書》及其註釋本，據說您是其中的主要寫手！您觀察到《信念書》至今對香港教會有什麼影響嗎？您感受到那時代香港一眾教會領袖如何回應時代變遷呢？這兩個問題請您多從神學角度剖析。

余：我經常都跟人說：我只能服侍我那一代，而我那一代的已過去了。《信念書》在當時面對的是回歸的所謂迷思。當時我們企圖用神學的歷史觀去看，我們問為何上帝把我們放在這一個歷史處境下，上帝對當日的教會、教牧、信徒是否有特別的心意？當時很多人預備移民，他們移民可能不會問這些問題，他們人之常情地顧念自己及家庭的安危。然而基督徒因信上帝掌管歷史，而祂的子民是祂塑造歷史的器皿，所以不能不問，上帝在這歷史的轉折點要我們作什麼？其實《信念書》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意思，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焦點，在於中國的改革和轉化，教會可以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可以有什麼貢獻？我們如何可以與中國教會同工、同行？就是我們這班神學家也好、牧者也好，我們怎樣可以與中國和中國教會發揮一定的影響？當時我們希望能提醒教會以上帝國度的視野去看這段歷史，用一個終末的視野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 去看當時發生的事。《信念書》的關注就在這裡。在其中，孕育、承托歷代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如何承傳、重塑以開出更美好的未來，也是我們所關注的。基督教信仰如何讓中國文化開出更整全的生命系統 (life system)。

徐：那麼您觀察這麼多年，是不是覺得《信念書》的確起到一個很有意義的作用？對香港、特別是福音派教會具有指導性？

余：最起碼的，《信念書》為當時的教會提供了一個探討性的架構，讓大家走在一起去思考香港教會的前路、個人的前路。這共同的探索思考將本來不相往來已久的普世派與福音派，進入對話，彼此加深認識，放下成見，進而合作。大事當前讓我們將合一的見證，看為重要。其意義相當重要，卻是沒有預期的發展。當時沈宣仁教授〔編按：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1986-1989）及崇基學院院長（1990-1994）〕調侃地說：余達心是帶領福音派出紅海這樣的一個人，跨越與普世派一直存在的鴻溝。第二點影響其實是喚起我們此時此地「做神學」(doing theology)，即顧及歷史處境，並投身其中以行動去做，而非抽象的思考。處境神學是《信念書》一個重要的取向。「處境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與「本色神學」(Indigenous theology)之別，就是不會聚焦於如何與傳統文化的儒道佛進行對話，而是面對現實的歷史處境，涉及到我們個人、教會的前途，安身立命之所在，如何回應將要來的挑戰？

徐：處境神學是非常重要的，其實每一代做出的神學(doin theology)都含有他那個處境，包括加爾文，其實他的書也有 contextual 神學，他不是寫一套叫做 standard 的 theology。

（專訪未完，下期續）